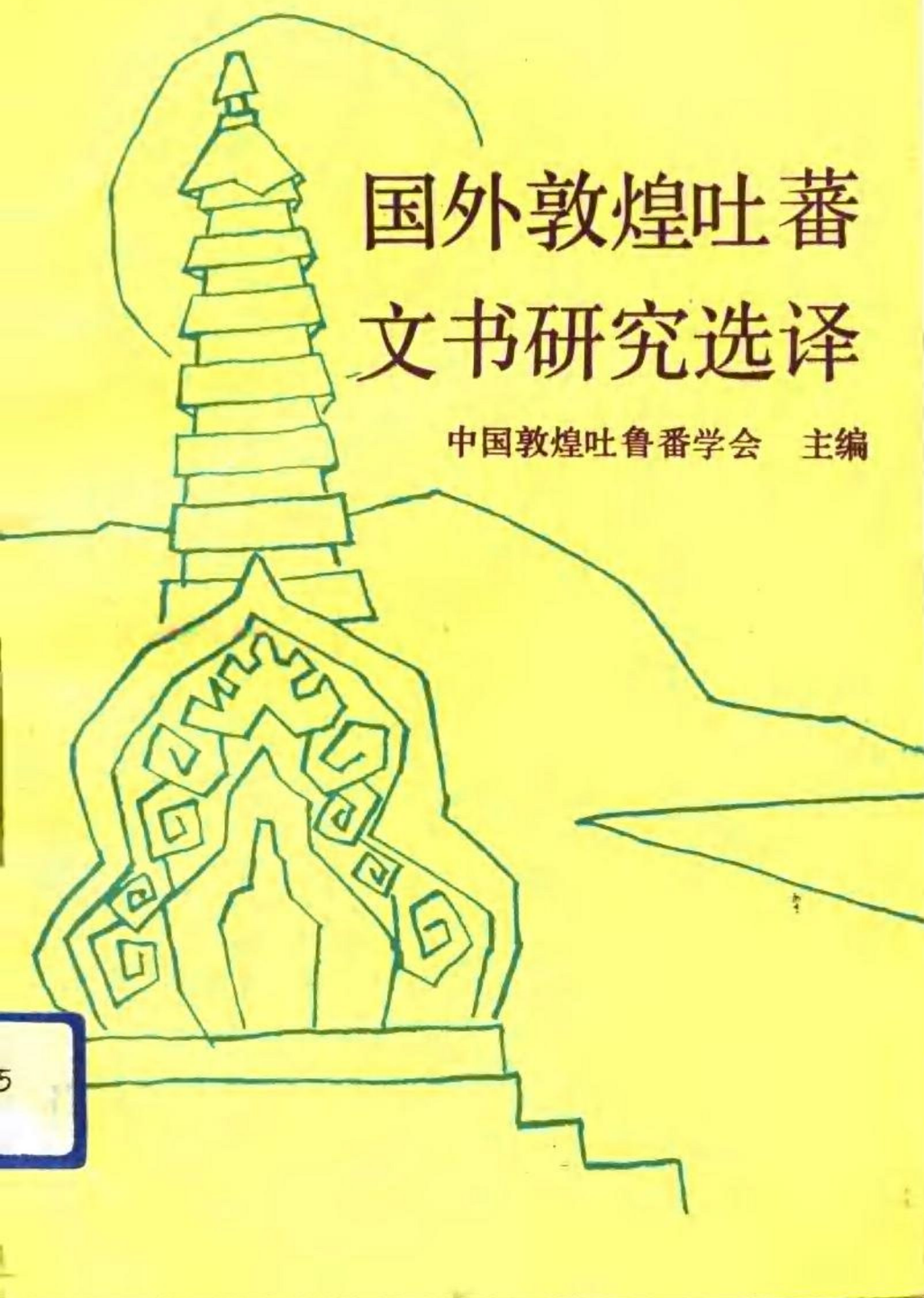


国外敦煌吐蕃 文书研究选译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主编



13408110

94
K297.5

10
2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

国外敦煌吐蕃 文书研究选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B

929002

(甘)新登字第01号

责任编辑:李德奇

封面设计:吴 祯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
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6-00357-0/K·37 定价: 6.15元

内 容 提 要

敦煌遗书中除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外，还有一些其它文字的文
献，其中又以吐蕃文书写卷为最多。由于帝国主义分子的劫夺，
绝大部分流散国外。国外从事吐蕃文书研究的最早是那些有机会
接触写卷原本的法、英、苏、德、匈等国学者，70多年来发表了
不少研究成果。为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敦煌吐鲁番学
会委托王尧先生组织编译了这部译著，以推动国内关于敦煌学的
研究和关于西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研究工作。



《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再加上另外一个优秀品质：善于发明创造，这两种品质合起来，就创造出来了长达五六千年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放异彩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学习他人之长，包括一切方面。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论，同样有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任务。当然，在这里，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发明创造仍然居第一位。学习他人之长与发明创造，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蒙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楠、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学习语言的才能，决不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就有必要看别人的翻译。我常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鄙薄翻译之意，我深以为

异。如果没有翻译，古代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如果没有翻译，欧洲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

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多，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之广度与深度日益加强，我们不可能广泛阅读所有原著，我们更有必要参看别人的翻译。这一点，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来说，更是迫在眉睫。这种学问是最近七八十年以来新兴起来的。在过去，由于有广泛的国际协作，才能取得如此令人兴奋的成绩。今后这种协作只能加强，而万万不能削弱。特别是日本学者和法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必须继承老一辈学者那种勤于翻译的传统，更进而发扬光大之，否则要想开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新局面是决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出一套研究译丛。请一些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翻译介绍的同志们参加翻译。我们也希望，其他同行们在著作之余，也能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国外论著加以翻译，以饕国内学人；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更多，研究水平一天比一天更高。

1984年8月1日

前 言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收录了12篇论文，是国外藏学家研究敦煌吐蕃文书写本写出的部分著述，新近翻译成汉语的。（文章倒不都是新近发表的，象《吐蕃的乌卜》的发表远在1914年，可以说是一篇古典作品了，不过，它是第一次译成汉语）希望它能引起国内同道的重视。尤其希望从事藏学和敦煌学研究的年青同道能从这一文集中看到：

第一，国外藏学界有哪些人在研究吐蕃文写卷？

第二，他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

第三，他们研究哪些方面？有哪些成果？

第四，我们应该怎么办？

最后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们编译、出版这个集子的目的所在，正象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中所说的：

“《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善于学习他人之长。”既然谈到敦煌·吐鲁番之学，不能不稍微回顾一下这一学科的历史。

敦煌石室遗书，自1900年王圆箴道士偶窥玄秘以后，引来西方和东方的学界强人，挟势奔来，巧取豪夺，洗劫一空，以致盛世遗珍，长期流落海外，居为奇货，秘不示人。吾国学者不得不飘洋过海去抄录、摹写、摄影，以求获得资料进行研究，这是极不正常，极不公平的现象。1931年，陈寅恪先生（1890～1969）就悲愤地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

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敦煌劫余录》序^①）80多年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有限时光，无穷变幻，白云苍狗，人事沧桑，经过血和水的洗礼，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抗争，无数的牺牲，我们中国赢得了尊严和独立，屈辱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学术界也得以昂首挺胸，就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而言，也可以与国外同行分庭抗礼。“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怎能忘记前辈学者历尽辛苦艰难而做出的创造性的劳动！他们的辉煌成就有如璀璨的明星永远照耀着祖国的上空。^②众所周知，敦煌石室遗书中除了汉文文献以外，还有吐蕃文、回纥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等众多文种，而以吐蕃文书写卷为最多，已知者即有5000卷号之巨，仅次于汉文写卷居第二位。但是，直到解放，或者说直到70年代后期，在吐蕃文书卷研究上，我国国内仍然是寂寥无声。^③对于这一情况，可以这样理解其原因：

- 1）由于吐蕃文书写卷绝大部分均已被席卷海外，国内一般人士无法接触，也无从研究。
- 2）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必须在西藏学的基础上进行。解放前，西藏学本身条件差，基础薄弱，更无力从事深层的研究。解放后，于道泉先生回国，尽全力从事西藏学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一时也难以分力从事吐蕃文书写卷的研讨。
- 3）从50至60年代的客观形势来讲，社会风尚和具体环境也不容许着手在当时看来似乎距离现实遥远的研究。

如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花争艳，嫣红姹紫，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事业也逐渐开展起来，我们有条件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从事吐蕃文书写卷研究最早的是那些有机会接触写卷原本的藏学家^④，法国的巴高（1877～1965）、拉鲁（1890～1969），还有伯希和（1878～1945）本人。在英国只有托玛斯（1867～1956）和威利布散（1869～1937），旅居美国的德国人

劳佛尔（1874~1934）是其中能接触原卷的幸运的外国人。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排成这样的系列：

托玛斯的论著有：

沙州地区	1927年
罗布泊地区	1928年
和阗地区	1930年
突厥与回纥	1931年
吐蕃军队	1933年
语言	1933年

最后汇集成三大册一套巨著《关于新疆地区的吐蕃历史文献》，于1935、1951、1955年出齐。1963年又有人收此三册的语词汇编成一册索引。

托氏又于1944年发表《楼兰·鄯善的早期人口》。

1948年发表《南语》。

1956年发表《东北藏区古代民间文学集》^⑤。

这是托氏生前最后一部研究吐蕃文书写卷的专著。应该肯定托玛斯先生在辨认、译解吐蕃文书写卷方面的主要成就。由于他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对有些问题也不能一一苛求了。

拉鲁发表的论文有：

《论佛教巫术》	1932年
《论藏文再后加字》	1933年
《吐蕃文书中的罗摩衍那故事》	1936年
《敦煌文书》	1947年
《高地亚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之路》	1949年
《在敦煌发现的最古老的吐蕃文书》	1957年
《皇家殡葬中的本教仪礼》	1953年
《8世纪吐蕃官员请求复职表》	1955年
《古代吐蕃疆域表》	1965年
《7~9世纪的汉藏关系》	1965年

更重要的是她以毕生精力编出的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敦煌吐蕃文书写卷三本目录：

第一册 1~849号 1939年出版

第二册 850~1282号 1950年出版

第三册 1283~2216号 1961年出版

拉鲁在敦煌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工作上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她逝世之后，1971年出版了一本500多页的《拉鲁女士纪念论文集》。可见藏学界对她的怀念。

巴高是法国最早的藏学家之一，有雄厚精湛的藏学基础，转而研究敦煌吐蕃文书写卷时，很快就显露出他出众的才华和敏锐的观察、分析的能力。1940年他与杜散托玛斯合作翻译、考释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这是以P.T.1286、1287、1038、1047及1290^⑥诸号文书写卷编译而成的最为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1）大事纪年：起自高宗永徽元年（650）到代宗广德二年（764）115年之间大事逐年记载。2）吐蕃赞普传记：包括历任大论位序，共10节，举凡会盟、征战、颁赏、联姻一类大事均有记载。还记录了民间传记、神话、轶闻和古代歌谣。完全保有古趣、信实可靠。3）吐蕃赞普世系及小邦邦伯、家臣表。此书虽然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年代，但一直为学术界重视，为西藏古史研究上的里程碑。

在这本大著出版后，巴高又发表了《北方若干国君王统记述考释》（即对P.T.1283号卷子讨论）1956年。《吐蕃史导论》，1962年。

戴密微（1894~1976）于1952年出版了扛鼎力作《吐蕃僧诤记》，全书398页。书中以伯希和汉文写卷4646号《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中心，进行长篇的历史考证。同时引用了下列敦煌写经：

伯3201纸背：破落外臣王锡第一份上吐蕃奏文、第二份奏文
伯2449纸背：敦煌汉僧为瓜州吐蕃节度使及其他吐蕃官员祈愿文
斯1438：吐蕃统治下汉官文书十七通
伯2765（即P.T.1076）：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
寺功德颂

伯255：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
还录有汉文藏文对译的《修道次论》等文献。

本书对于吐蕃王廷中佛教两派——“顿门”与“渐门”的争端做了详尽的考述，纠正了后来藏文史书如《布顿教法史》、《贤者喜宴》等要籍中所提到的若干事实，具体明确了汉地禅宗在吐蕃的布教活动，澄清了历史上的迷雾。尤其是对于吐蕃王廷里两股势力的斗争，印度学派与汉地学派的交锋，都是以第一手的材料进行论述。谢和耐（法国汉学家）曾于1979年在《通报》中指出此书中的“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不为过誉。此书一出激起了巨大反响，50年代后期，又有日本佛教学者冢本善隆、意大利学者杜奇，对这本书中的中心即吐蕃佛教论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60年代、70年代一批日本学者如山上大峻、山口瑞凤、今枝由郎、小岛宏允、原田觉冲本克己、田中良昭、木村隆德等陆续作出广泛地迂回搜索，对吐蕃文书写卷P.T. 116、117、812、813；S.T.468、709、710等号做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修正了戴氏的论点，并把吐蕃佛教研究推向新的高峰。^⑦

回顾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历史可以隐约地看出有两个高峰：

（1）巴高等人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40）

（2）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1952）

事实上围绕着他们二位的著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探索其他交叉的或有联系的领域，以致出现一批新的著作。^⑧

至于如P.T.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王统记述》，P.T.960号《于阗教法史》，P.T.1071号《法律文书》等等也曾出现过

不小的波澜，一时为藏学界所重视。

我们是否还可以看看这些年国外关于吐蕃文书写卷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从这几年见到的材料来看，取得进展最大的几位是乌瑞、今枝由郎、山口瑞凤和戴密微，他们这几位分属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懂汉文。都能阅读汉文典籍，能以汉文史料与吐蕃文献相互印证、补充，纠正其错误，使吐蕃文书写卷的重要价值得以放光四照。

另外一点是，近几年取得成就的学者们能以吐蕃文书写卷与后来的藏文史籍相比较，从而廓清历史上的迷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点是这些学者们对于敦煌吐蕃文书写卷的语言与现代藏语（特别是安多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大地推动了研究事业的进展。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在编选这本译文集的过程中，得到耿昇、沈卫荣、陈楠、王湘云等几位青年同志的大力协助，应该感谢他们的辛劳。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辛苦地审阅了译稿，特此表示感谢。

王 尧

1986年11月

于北京

注 释

①请参阅王重民的《敦煌文物被盗记——并论其在学术上所造成的损失》（载于1951年5月号《文物参考资料》，新收入《敦煌遗书论文集》）。文中把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自己的日记或文稿中袒露的事实一一译载，可谓触目惊心。虽事隔多年，仍令人深感痛楚。

②我们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陈援庵、周叔迦、刘半农、向觉明、王重民等已故的先辈，还有更多健在的名儒老宿。

③于道泉先生在海外数探龙穴，遍访法、英图书馆，查阅所藏。但屡为当事人所障阻，迄未得珠。请参阅《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上的文章所述。

④石泰安教授在《敦煌吐蕃文献选集》第二辑序言中，也表示了对于“只有少数有机会接触原卷的藏学家才能从事研究工作”的情况不满。

⑤书中把4个吐蕃文书写卷联系起来，编成本书。共分6节：A、美好时代的结束与马和牦牛的悲剧，父亲登根聂巴的葬礼与金堡牙寨新娘的故事。B、金堡牙寨新娘的故事。C、美好时代的没落。D、没落的年代，“儿”王朝及其宗教。E、苏毗母亲的教谕。F、巫师——占卜。

1965年油印本《藏文古史资料述略》。1980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一期刊载介绍。

⑥这里引用的是根据拉鲁目录新定的编号，与原书中引用的登录号有所不同。

⑦请参阅张广达《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载《学林漫录》三集）。

⑧如日本的佐滕长《西藏古代史研究》，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意大利的杜奇《西藏的佛教史》德国的霍夫曼《西藏的宗教》。

目 录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	季羨林 (1)
前言·····	王 尧 (1)
吐蕃的鸟卜·····	〔德〕劳佛尔著 (1)
	陈楠 赵炳昌译
景教和摩尼教在吐蕃·····	〔匈〕乌瑞著 (56)
	王湘云译
《8世纪吐蕃官员呈文》解析·····	〔法〕拉露著 (73)
	岳 岩译
生死轮回史·····	〔法〕今枝由郎著 (105)
	耿 昇译
吐谷浑王国编年史·····	〔匈〕乌瑞著 (170)
	沈卫荣译
吐蕃王朝时代告身中使用隐喻的情况·····	〔法〕石泰安著 (213)
	岳 岩译
干支纪年法在吐蕃的应用·····	〔匈〕乌瑞著 (228)
	王湘云译
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书·····	〔法〕石泰安著 (251)
	高昌文译
论“祖拉”及吐蕃的巫教·····	〔法〕石泰安著 (282)
	耿 昇译
《北方王统记述》考·····	〔匈〕李盖提著 (341)
	岳 岩译
藏语亲戚关系词“甥”考释·····	〔西德〕于伯赫著 (375)
	沈卫荣译

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所藏敦煌吐蕃文献

.....〔苏〕沙维特斯基著（390）

沈卫荣译

吐蕃的鸟卜

〔美〕

劳佛尔

著

陈楠

赵炳昌

译

在伯希和所发现的藏文卷子中，有一大小为 0.85×0.31 米，内附一份卦辞表的硬纸卷（国家图书馆藏，临时编号3530）。这一写卷最近已由巴阔先生翻译出版。

巴阔在他过去发表的一篇著作中，列举了用藏文草体书写的710个最常用的藏语词汇，这些词汇来源于他在西藏东部旅行时获得的一份手稿中。巴阔的这一著作表明了他的藏语知识是十分丰富的。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法国由阿贝尔、雷穆萨、伯诺和福科司开创的，由菲尔和列维发扬光大的光荣传统，将在年青的朝气蓬勃的藏学领域里获得新生。这一传统就是以足够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去触及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使我感到庆幸的是，伯希和的这一神奇的发现，将会大大地丰富对藏语的研究，并将给这曾可悲地被忽视了的学科以新的生命。

迄今为止，人们仅是依赖最近出版的上一世纪遗留下来的文稿，对藏语音位学进行研究的。因此，伯希和在甘肃千佛洞中所发现的10世纪甚至可能是9世纪的《甘珠尔》古版本，连同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藏文写卷，无疑标志着藏语音位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起点。因而我们有理由急切盼望早日对这些重要的原始资料作出详尽的解释。

巴阔所发表的文章是关于伯希和发现的藏文文献的第一篇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章。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都要感谢巴阔过去发表的

这篇文章，感谢他那创造性的劳动。不论是从语言学还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巴阔的这篇文章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巴阔在出版和翻译这篇文献上的功绩是卓著的。首先，他出色地完成了将原形草体词汇译为标准的楷书，并以一种大体令人信服的态度尽力对这些词汇作出了判断，这对于一个从未有机会见过这种草书的人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他辨认出一些字的古体形式，并正确地用现代同义词对这些古词加以注解。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之外，他还正确地翻译了卦辞表的原文。

然而，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我的看法与巴阔是不一致的。这就是对卦辞表含意的解释和对卦辞表绪言的翻译。关于后者，巴阔倾向于将它作为一系列似乎是以渡鸦为主题的谜来考虑的。他最后将每一诗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成分（全部绪言由29行诗组成，每一行包括一个扬抑抑格和两个强弱格——一种韵律特殊的，不以梵文为格式的藏语）；而在我看来，这些诗文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相互关系使得对卦辞表的解释一致起来。正如巴阔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他把绪言部分视为由闪电宣示的一系列先兆；在他所著第一卷中，我们见到了诸如“当闪电出现在东方时”的译文。与这一解释相对应的藏语应是ngan zer na，字面意思为“如果魔鬼说”。据我所知，任何权威人士，无论当地人或外国人，都不会认为这句话有任何“闪电”的含义；它仅简单地代表“说不吉利的话”而预示着不幸。正如叶斯开词典解释的那样：ngan，更深刻的含义为“魔鬼，诅咒”。在月光词典（北京，1838年）中短语ngan smras译成蒙文为“说坏话”的意思。在此例中，ngan zer是指渡鸦和乌鸦叫声中令人不愉快和不吉祥的声音。这一点确实明白地写在前言中，是这个卦辞表中卜卦的主题。此外，有关谁是供品的接受者这一问题，在绪言里也是没有疑问的，在诗文第八行（按巴阔的统计为第四行）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供品是献给乌鸦的”，而这乌鸦肯定是第一行